

●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

● 张华青 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致 与 冲突

一致与冲突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著

张华青 林恒增 张同俊 译

孙哲 侯力强

竺乾威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汤中仁
封面装帧 傅惟本

一致与冲突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著

张华青 林恒增 张同俊 译
孙 哲 侯力强

竺乾威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编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第七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12.5 插页 4 字数 303,900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8-01972-X/D·387

定价 16.00元

中译本序

俞 吾 金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是当代政治社会学领域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是紧紧围绕一致与冲突这个当代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课题来展开的，它为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社会的结构和运作、了解当代西方政治社会学中各派思潮的争论提供了一把钥匙。

著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Seymour Martin Lipset, 1922—)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他出生于纽约，1949年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0至1956年留在该校任教，由助教升位为副教授；1956至1966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担任社会学教授，1962至1966年兼任该校国际研究学院院长；1965至1966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开设“政府与社会关系”讲座，并于1966至1975年间担任国际事务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1975年至今任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与社会学教授并兼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0至1982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李普塞特勤于笔耕，著述颇丰，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农业社会主义》(1950)、《工会民主》(1956)、《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流动》(1959)、《政治人》(1960年出版，1981年再版)、《第一个新国家》(1963年出版，1979年再版)、《革命和反革命》(1968)、《非理性政治》(1970年出版，1978年再版)、《大学中的造反》(1972)、《学术与1972年的选举》(1973)、《教授、学生俱乐部与美国高等教育》(1973)、《分裂的学术界》(1975)、《哈佛大学的教育与政治学》(1975)、《关于美国政治的

对话》(1978)、《信仰的裂痕》(1982),等等。与他人合编的主要著作有:《阶级、地位与权力》(1953)、《劳动和工会主义》(1960)、《社会学:近十年的进展》(1961)、《文化和社会性格》(1961)、《社会结构、流动和经济发展》(1966)、《政党制度与选民联盟》(1967)、《一个梦的失败?关于美国社会主义史的论文》(1974)、《第三世纪》(1979)、《80年代的党派联合》(1981),等等。由于李普塞特在社会学,尤其是政治社会学方面的创造性的贡献,美国社会学学会早在1962年就向他颁发了麦基佛奖。今天,李普塞特的社会学理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影响。

本书是李普塞特从已发表的论文中挑选并集中起来的第二本论文集。第一本论文集《革命和反革命》主要探讨了民主社会的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和政党冲突;本书则主要着力于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内在冲突及一致性关系的探索。在这本论文集出版之前,托马斯·伯纳德已出版了《冲突与一致之纷争》(1983)一书,对马克思主义者和从孔德、杜尔克姆到帕森斯的主流社会学家之间在研究冲突与一致问题上的趋同的倾向作了详尽的分析,强调他们之间的共识要多于分歧。然而,伯纳德未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李普塞特的这本论文集则对一致与冲突这一主题作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第一,李普塞特论述了社会结构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以杜尔克姆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注重的是社会内部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以及由利益的冲突必然引起的社会变革;相反,功能主义注重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及对社会结构的静态的分析,因而似乎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社会冲突和社会变革的忽视。事实上,在李普塞特看来,在如何对待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有许多趋同之处,甚至有相互重叠的地方。其一,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都假设社会制度经常力求保持平衡,因而都

十分重视对社会制度的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均衡关系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在分析中运用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的概念来描述不同形态的社会结构；功能主义则运用了以结构—功能为轴心的系统方法来分析社会结构的不同要素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其二，马克思主义强调，任何社会结构或制度都不可能是永恒的，其内在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冲突的产生及社会变革的来临；功能主义虽然注重对社会结构的静态分析，但也不否认社会内部的结构矛盾以及由此必然引发的社会规范的失衡和社会冲突的发生。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看作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而功能主义则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精英人物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看作是社会变革的基本缘由。其三，马克思主义分析了社会变革的条件，特别是马克思强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功能主义也用“结构紧张”、“社会控制失灵”、“权力资源流失”等不同的概念论述了社会变革的必要的前提。其四，在社会分层的问题上，虽然马克思主义主要通过对经济关系的分析引伸出“阶级地位”的概念，功能主义则通过对经济、政治权力等多种因素的分析，引伸出“身份地位”的概念，但这两种方法也自有其接近之处，即都探索了社会制度中的等级关系。李普塞特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一方面是社会制度的一体化和官僚主义体系的稳步发展，另一方面则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愈来愈多的人对自由、民主和参与的追求。所以，研究一致与冲突的关系也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学理论所无法回避的，因此，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功能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共同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李普塞特论述了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融合和相互冲突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起因是这样的：在50年代，李普塞特和丹尼尔·贝尔、爱德华·希尔斯、雷蒙·阿隆等人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口号，到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由于左翼政治和“新左

派”的兴起，“意识形态终结”的口号受到了激烈的抨击。李普塞特认为，这样的抨击是没有理由的，“意识形态终结”这一思潮的出现是有其历史和理论渊源的。这方面的论述最早出现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在恩格斯看来，一旦人们认识到意识形态的现实的物质基础，所有的意识形态也就终结了。马克斯·韦伯也认为，随着“实质理性”（追求最高价值）向“功能理性”（注重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的转变，意识形态的整体衰落乃是必然的结果。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也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揭示了意识形态衰落的现象。50年代的“意识形态终结”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李普塞特辩解说，“意识形态终结”并不意味着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的终结，也不意味着乌托邦式的幻想、阶级斗争及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立场的终结，而是指一整套支持工人阶级反对现行政府斗争的革命学说的终结。李普塞特同意希尔斯的看法，认为这种革命学说就是“维多利亚时代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他还认为，尽管这种学说在不发达国家依然存在，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它已经衰落并终结了。李普塞特还辩解说，肯定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等于否定激进运动，尤其是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既有各种意识形态在功能理性基础上的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又有各种新见解、新思潮（即新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扩而言之，在现代社会中，可能消失的是某一种意识形态，而并不是整个意识形态，只要意识形态在延续下去，其中各个成分之间的融合和冲突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李普塞特论述了社会生活中不同政治力量的整合与分裂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政党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最初，政党是由某些名人和具有共同思想倾向的人创立起来的，随着其成员的增加，它们把一些地方性社团整合到自己的

内部,然后在国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具有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中,每个政党都建立了跨地区的沟通网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国性的政党体系。政府作为权力机构,体现了各个政党、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整合和协调的关系,然而,由于各个政党在它们所代表的利益与宗旨上的差别,它们之间常常会发生分裂乃至冲突,即使在同一个党中,也可能形成不同的派别和分裂。引起不同政党或政治力量之间的分裂和冲突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或起因于对传统宗教和文化的不同的理解和信仰,或起因于经济发展或工业革命中的利益错位,或起因于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或起因于民族关系中的对抗,等等。李普塞特详尽地考察了西方各国的政党制度及不同政党之间的整合关系和分裂关系,从而表明,一致与冲突的并存也是我们理解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尤其是政党关系的一把钥匙。

第四,李普塞特论述了保守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现代主义思潮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便开始酝酿,从本世纪20年代起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意味着教会影响力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式微,意味着世俗化和更自由或“更放荡的”个人主义道德观念和性解放观念的兴起。战后发达工业社会体系的形成,在家庭与性行为、平等与参与、环境保护主义等各个方面进一步推进了现代主义的发展,从而与传统的工业社会的价值观构成尖锐的冲突。保守主义作为右翼运动,认为由现代主义为导向的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是腐败的,力图复兴传统的民族文化与社会结构。保守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欧洲的保守主义通常支持国家权力的增强,美国的保守主义则强调地方权利、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甚至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标榜为自由主义。在欧洲,法西斯主义就是保守主义的一种极端的形式;在美国,原教旨主义、三K党、麦卡锡主义等也都属于保守主义之列。在发达工业社会的背景中形成起来的新左派,从外观上看是激进的,实质上也具有反现代主义(尤其是反对现代社会的精神压抑)的保守主义倾向。在西方国

家的不少政党中,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或交织在一起,或发生冲突和分裂,表明了西方社会在价值取向上的多元化状态。

最后,李普塞特论述了美国社会中的道德主义和暴力主义的关系。道德主义是美国人从以往的新教传统中继承下来的一种思想倾向。它主张人性的完美,谴责罪恶的行为。作为政治运动,它一直延续到今天,如反对种族隔离、保护自然资源、禁酒禁毒、维护妇女选举权等等。但是在美国,道德主义也是暴力主义的来源之一,因为一些乌托邦式的道德主义者强调用暴力惩恶扬善,把暴力行为作为道德游戏的手段,对约翰·F·肯尼迪、梅德加·埃弗斯、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F·肯尼迪的枪杀就是这种暴力主义的典型表现方式。道德主义和暴力主义的互渗和对峙也是当代西方社会中一致与冲突关系的一个缩影。

综上所述,李普塞特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述了西方政治社会生活的主题——一致与冲突的关系,从而表明,当代社会学中的各种理论虽然见仁见智,迥然各异,然而在对这一关系的认识上却有不少共同之处。事实上,一致与冲突的关系是任何社会学理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李普塞特在强调趋同性的一面时,忽视了对差异性,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本质差异的深入分析,显然是不合适的。另外,他也没有准确地理解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终结”这一论述的确切含义,在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乃是一种虚假意识,意识形态家们通常认为,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在以前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思维材料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一旦人们认识到每一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不过根源于该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那末意识形态也就终结了。这个意思是说,意识形态的虚假的神话也就结束了。恩格斯并没有说意识形态从此就不存在了。至于李普塞特用“意识形态的终结”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终结,那就更是错误的了。事实表明,社会主义运动虽然遭到了一定的挫折,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之过,而是由于不准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

引起的,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社会主义的事业一定会兴旺起来。另外,只要深入领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我们就会发现,一致与冲突的关系已蕴含在马克思的辩证法,尤其是矛盾学说中。这就告诉我们,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准确地理解一致与冲突关系的前提。

1992年10月6日于复旦大学

目 录

中译本序	俞吾金
导言	1

第一部分 分析的趋同

第一章 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	11
一、社会变革的功能主义分析	12
二、社会分层	22
三、价值合理性	26
四、结论	37
第二章 社会分层与社会阶级分析	53
一、理论方法的类型	55
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57
异化(61)	
三、韦伯的分层方法	62
阶级(62) 地位(64) 阶级关系与地位关系(66) 社会结构 与政治冲突(66) 权力、地位与官僚制(68) 官僚化与异 化(68)	
四、功能主义方法	71
杜尔克姆与功能主义理论(74) 社会不正常状态、社会变革 与反叛(75) 实证研究(77) 对功能主义方法的批评(78) 功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80)	
五、分层的维度	81

客观的阶级概念(82) 一致的地位(84) 主观地位(85)	
六、客观与主观取向	86
稳定与不稳定的地位体系(88) 社会阶级的未来(90)	
第三章 一种观念及其沿革：意识形态的终结	96
一、观念的起源	97
二、近期的系统阐述	100
三、对学生风暴的反应	104
四、肯尼迪的阐述	109
五、新政治的期望	111
六、意识形态终结的意识形态	117
七、经验分析	121
八、结论	123

第二部分 冲突与政治

第四章 分裂结构、政党制度与选民联盟	133
一、最初的系统阐述	133
对比较分析提出的问题(133) 政党：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136) 分裂的层面：一种可能的模式(140)	
二、分裂和联盟的层面	144
分裂的两个层面：地区—文化分裂和功能分裂(144) 两种革命：民族革命和工业革命(148) 国家充分动员时产生的分裂(161)	
三、分裂结构向政党制度的转化	165
反对势力宣泄的条件(165) 四个入口(166) 选举游戏的规则(170)	
四、欧洲政党制度形成的模式	174
四个关键的层面(174) 一种模式，三个阶段(177) 发展与偏离：维护地方利益的政党(184) 发展与偏离：维护农民利益的政党(188) 第四阶段：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与结构的差异(191)	

五、对于比较政治社会学的意义·····	197
第五章 激进主义还是改良主义：工人阶级政治的根源·····	216
一、地位体系·····	218
二、参与权·····	225
三、一体化的努力：英国和德国·····	238
四、结论·····	244
第六章 对现代性的反抗·····	256
一、反弹政治·····	260
二、美国·····	260
三、欧洲·····	265
四、后工业社会·····	272
五、新政治·····	274
六、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	277
七、反弹政治的再现·····	279
八、欧洲·····	280
九、美国·····	285
十、结论·····	296
第七章 价值观和政治结构：美国社会的道德主义、运 动和暴力行为·····	308
一、“不信奉国教者的异议”·····	313
二、道德主义与外交政策·····	316
三、缓和的困境·····	318
四、道德主义与国内政策·····	320
五、道德主义的反弹·····	322
六、排外主义与新的种族划分·····	324
七、20世纪80年代的道德主义·····	325
八、左翼道德主义·····	329
九、“运动”政治·····	331

十、道德主义与两极化·····	332
十一、为什么会出现暴力行为·····	333
十二、为什么行刺总统·····	336
十三、结论·····	339

第三部分 结 语

第八章 预见未来：社会科学鞭长莫及·····	345
一、案例研究：增长极限的讨论·····	359
二、对增长的关注·····	363
三、增长和非增长的后果·····	365

导 言

本书是我已发表的论文的第二本集子。第一本论文集——《革命和反革命》中的文章基本上是以我的两本早期著作《政治人》和《第一个新国家》中提出的论点为基础并发展而成的。这两本早期著作分析了民主社会的社会前提，研究了被世界性的比较用语和美国用语都称作是“民主的阶级斗争”的政党冲突，并对拉丁美洲、加拿大和美国的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作了比较。

收入本书的文章，正如书名所示，主要探讨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此外，就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维护秩序与一致的方法，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本书前三章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揭示被过份夸大的冲突与一致两个范式之间的差异——一些自称为“冲突学派”的人竭力强调这种差异。所有的复杂社会都是以内部高度的紧张和冲突为特征的，所以制度和价值观一致对这些社会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条件。因此，探讨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必须涉及冲突与一致。

冲突范式的倡导者对强调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与意识形态相混淆的方法无助于人们认识导致冲突的社会内部利益或矛盾的多样性。

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作为一个被冲突理论家说成是所谓一致学派的追随者并受到批评的人，我乐意指出我的政治社会学的大部分内容探讨的是冲突和变革，而不是一致和整合。我研究过左派和右派的一些以剧烈变革为导向的运动，研究过工会作为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的政党冲突，以及作为变革媒介的学生

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本书第一部分，我探讨了其他一些被划为一致学派的社会科学家分析社会变革和冲突的方法。

冲突学派的理论家不同意全民价值体系这一假设，也不赞成功能主义的这一观点——不平等体系和社会分层体系主要建立在社会内部对地位、身份或角色的相对稳定性具有一致的看法之上。为了详细说明共同的全民价值观，有必要从比较的角度来加以对比考察，有必要认识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之间的差异。玛格丽特·米德在不少场合都指出，为了比较分析起见，一个民族的“样本”是需要的，因为所有个体都来自并生活在一些独特的文化中，因而这些文化反映了他们的社会或亚群体的一些独特的价值观。^①一个外来者（即使是来自文化极为相近的国度）对邻国特有的一些价值观会表现得非常敏感。加拿大学者沙卡文·伯科维奇在谈到他对60年代冲突四起的美国的看法时，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我第一次接触到美国式的一致是在60年代末。那时，我跨过边界进入美国，发现自己置身于美国的神话之中。这一以加拿大和墨西哥国境线为界的神话不是关于北美的，而是关于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尽管有随心所欲的疆域，尽管有令人困惑不解和混杂的种族和教义，却仍然信仰着一种被称之为真正的美国的东西，可以把一种宗教象征所具有的一切道德的情感的吸引力赋予一种人所共知的捏造……犹太无政府主义者波尔·古德曼在这里斥责中西部背弃诺言；美国黑奴的后代马丁·路德·金在这里谴责非正义违背了美国方式；一场关于国家命运的争论在这里没完没了地进行……保守派要驱赶非美国人，新左派历史学家则号召这个国家履行它的神圣使命。

我的加拿大背景无助于我面对这一情景……它给予我的只是一种像人类学家对这一部落的象征留下一一种奇怪

感。……对一个满腹狐疑的加拿大人，一个上帝之国的异教徒来说……[这是]一个由一致的意识形态联结在一起的、多元的、讲究实际的民族……

让我再重复一遍这个陈词滥调：意识形态的一致。它并非我在1968年所发现的那种例外论的概念……它是数以百计的派别，虽然彼此之间毫不相同，却都在执行着同一使命……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可能比那些通常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更为狭隘，但却更为有用。它表明了神话的日常功用……这样，尽管我所说的一致并非是人口普查者所称的社会的一种量度，尽管它的功能历来是使社会现实神秘化或为社会现实戴上一顶面具，但它仍然意味着某些同样“真实的”东西：一种价值观、象征和信念体系，以及一系列用以维持这一体系的仪式。②

美国的价值体系不同于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甚至包括加拿大），这一概念当然不是伯科维奇先生或某些保守派学者的发现。差不多在一个世纪前，一位访问过美国和加拿大的欧洲旅游者就对这两个国家作了一番比较。在解释加拿大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时，他提出了两国在价值观上的差异，认为加拿大仍然与欧洲相似。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认为，为了发展经济，加拿大需要注入“美国精神”，注入“扬基血统”。③一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分析家如安东尼奥·葛兰西、利昂·萨姆森、冈纳·米尔德尔以及迈克尔·哈林顿在致力于说明这个国家中的政治行为时，都提到了普遍接受美国主义和美国的信条，并对其内容都持一致的看法。④但是正如伯科维奇所强调的，这样一致并不能防止冲突；它可能正好是用来限定美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斗问题的一些东西。萨姆森在30年代指出（哈林顿后来在70年代对此表示赞同，并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论证），社会主义者在美国的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是用欧洲的而不是美国的语言来表达其事业的。